

超级语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理论

李艳著



Chaoji Yuxi

LISHI BILIAO YUYANXUE DE XINILU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超级语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理论

李艳著



Chaoji Yuxi

LISHI BILIAO YUYANXUE DE XINLILU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理论/李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

ISBN 978-7-5161-0613-6

I. ①超… II. ①李… III. ①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东亚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648 号

超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理论 李艳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黄燕生 蔺 虹

责任编辑 蔺 虹 叶昕媛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戴 宽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39570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9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亲缘比较语言学的新视野

1996年8月，王士元教授应邀莅临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专业访问。这次机缘，不但使后学有幸专门请益王先生，而且承蒙惠赠附有手批的《汉语的祖先》（*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美]《中国语言学报》专题论文集系列之八）。后王先生来信，约撰一篇关于此论文集的评论。1996年秋在北京大学访学而萌发汉译之念，次年元月承赐函授权。《祖先》涉及的知识面太广，我在研读中已觉步履维艰，汉译时倍感如履薄冰。然而，这样一本汇集了20世纪下半叶一流汉学家探索汉语祖先成果的论文集，没有汉译本实是学界遗憾。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虽然我在1997年就完成了白一平论文的初译，但直至2002年接受了几位英语背景的博士后人员和博士研究生，翻译工作才全面展开。

蒙中华书局青睐，《汉语的祖先》2005年10月终于面世。前附7万字的拙序《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算是完成王先生约撰评论，编辑说这是中华书局出版译著中的最长译序。2010年12月，王士元教授应邀到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讲学。王教授在交谈中提到，他对学生说：“《汉语的祖先》中的有些论文可以不看，但是李教授的译序一定要看。”

在该序“余论”部分，我曾写道：

语言的亲属关系可以分为远亲关系（超级语系）和近亲关系（传统语系），或者不同历史阶段和历史层次的亲属关系。基于某一原始义项表以及其他语言结构因素，依据一定的比较标准和评估程序，可以确定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梯度。

发端于18与19世纪之交的西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一些基本理

论问题尚未及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所幸印欧语言是人类历史上罕见和典型的分化型语言,其语言结构的形态变化和历史文献的拼音字母又为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然而,在随后而来的推进世界性语言关系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却迎来了一系列在印欧语言比较中没有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基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谱系树模型的膨胀,超级语系的建构实在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必然,尽管持传统观点的学者难以接受;另一方面,超级语系的建构浪潮势必导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实现重大突破——从语言的同源性研究转向语言的亲缘度检测。以建构祖语为目标的同源性研究重在定性,而基于相关语言要素统计的亲缘度检测则重在定度。显而易见,如仍囿于传统的同源论研究模式或谱系树模式,定会陷入用以历史比较的例词究竟是否借用的针锋相对,而亲缘度研究理念却可以避免在目前或可能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这部集诸家之见的《汉语的祖先》,尽管假说蜂起、莫衷一是,甚至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但是无疑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中国学”学界关于汉语起源研究的一流水平,昭示着21世纪东方语言以至于贯通欧美相关语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趋向。通过这本论文集,不但可以从当代一流的欧美汉学家或历史语言学家的不同假说中得到启迪,而且可以借鉴其研究方法以推进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开拓和实际操作。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以及试图参与者,我相信,本书汉译的出版,无论是对于汉语古音以及原始汉语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境内的民族语言乃至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的研究,以及国际历史比较语言学或者语言关系类型学理论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相继提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1990)、“汉语史研究的‘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1993, 2003)、“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1996)、“语言关系类型学”(2000)和“亲缘比较语言学”(2005, 2009)等一系列理论。闻《祖先》墨香之余,唯祈有年轻学子,愿为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超级语系的理论和方法的译介和研究作出贡献。

2006年9月李艳入学后,根据其外语专业背景,我建议她从事历史

比较语言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几乎无人系统译介国外最新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也许,从事历史比较的学者觉得只要自己能读懂西方文献就行了;也许,从事历史比较的学者觉得就一些具体问题加以研究比译介更有价值。当然,毋庸置疑,译介国外理论不仅耗时费神,而且有相当难度。

我们的最初工作是从合作翻译开始的。先是[法]沙加尔(L. Sagart)的 *The Higher Phylogeny of Austronesian and the Position of Tai-Kadai* (南岛语系高层发生史及其台—卡语的地位),接着是[荷兰]德里姆(G. van Driem)的 *Sino-Austronesian vs. Sino-Caucasian, Sino-Bodic vs.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 as Default Theory* (汉—南语系与汉—高语系、汉—蕃语族与汉—藏语系以及尚未证明的藏缅语系假说)。每篇译文都要一来一往几十次,其中不少疑难问题,还要当面商讨,反复深究。2006 年 12 月,我带她一起去上海出席“东亚语言比较国际研讨会”,她的眼界为之大开。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感觉是:李艳的特点是好学与刻苦。她正在逐步入门——从国际音标的逐一识记,到对众多语种主要特点和地理分布的慢慢熟悉,再到文化考古历史背景的不断补充。

入学一年后,李艳已积累了一系列新知,明确了研究思路。2007 年 10 月,通过开题报告《当代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研究》。此后,进入更为紧张的论文撰写阶段。除了上课,她就是研究和写作。我对做研究和写论文的要求,一直是“如影随形、朝思暮想、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虽不能全至,但心向往之。秋去春来,几度寒苦,三易其稿,2009 年 5 月,李艳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

作为导师,我对李艳博士论文的评语是:

东亚语言关系研究和超级语系建构是当代历史比较的前沿课题,但是对西方学者有关东亚语言关系、汉语系属的最新假说,以及超级语系的学术背景,中国大陆学者知之甚少。该研究首先对当代西方学者的诸多假说进行全面梳理。主要包括:[加拿大]蒲立本的汉藏—印欧语系假说、[美]白保罗的澳泰语系假说、[俄]斯塔罗斯金的汉—高语系假说、[法]沙加尔的汉—南语系假说等。另外还涉及[美]白保罗、[美]马提索夫的汉—藏语系假说、[荷]德里姆的汉—蕃语

族假说,以及[美]格林伯格的世界四大超级语系说。其次,阐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包括邢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的华澳语系假说,李葆嘉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语言关系类型学和亲缘比较语言学理论,以及谈济民、周及徐为汉—印欧语系假说提供的成批同源词。此外,还有[旅爱沙利亚]高晶一的汉—乌同源假说。再次,对语言同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词汇比较、语音对应、形态对应及多学科参证等进行了分析。最后,在[美]斯瓦迪士、[俄]雅洪托夫、郑张尚芳等提出的词表及诸家论证中所涉词例的对比分析基础上,初步提出东亚语言历史比较的基本义位表。该论文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东亚语言关系和超级语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作用。该论文前后历时两年半。该生在论文写作过程勤读原典、反复斟酌,体现了认真治学的态度。

外校专家的盲审评阅意见是:

第一份:当代西方语言学者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创获,系统总结和介绍他们的学术成果,对推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该文在广泛收集当代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要论著的基础上,对东亚语言关系和超级语系建构两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对语言同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词汇比较、语音对应、形态对应以及多学科相互参证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东亚语言历史比较的基本义位表。就当代历史比较语言学进行如此规模的整理和介绍,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应该说还是第一次,对开展相关研究无疑具有参考价值。论文资料充分,梳理细致,研读深入,评判允当,表现出作者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理论语言学修养,也能够看出作者在研究问题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是一篇质量较高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由于涉及文献较多,在梳理其中的成果时,有时显得不够深入。

第二份: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对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但国内语言学界对此介绍得并不充分。该文对当代西方学者有关东亚语言关系的假说、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拓宽学术界视野,推进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深入开展具有十

分积极的意义。论文在全面研读原典的基础上,对东亚语言关系研究和超级语系建构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中国学者有关超级语系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西方学者语言同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西方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学者具有的重要借鉴作用,对国内语言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无疑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论文资料丰赡,梳理清晰,观点明确,表达流畅,表现出作者具有较高的理论语言学修养和较强的研究能力,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由于涉及的学者和研究成果较多,显得重点不够突出,挖掘不够深入。

第三份: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对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多有研究和借鉴,但对当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却较少关注,特别是对东亚语言关系研究这样的热门课题还没有足够的投入。该论文以当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作者收集了当代西方关于东亚语言关系和超级语系建构两方面的重要文献,并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也对中国学者有关超级语系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可见作者掌握本学科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献的评述深入得当。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全面梳理了当代有关东亚语言关系和超级语系建构的成果,分析了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语言同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东亚语言历史比较的基本义位表。这些对汉语与其他语言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文章概念清晰,语言流畅,说明作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探索的能力。该论文是一篇比较扎实的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如下:

李艳的《当代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当代西方学者有关东亚语言关系和超级语系的假说、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对拓宽学术界视野,推进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深入开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该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全面梳理了当代有关东亚语言关系和超级语系建构的成果,分析了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语言同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初步提出了东亚语言历史比较的基本义位表。这对于汉语与其他语言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该论文概

念清晰，语言流畅，说明作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探索的能力。这是一篇很扎实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人对答辩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投票表决，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经过修订，李艳的博士学位论文改名《超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理论》出版，应为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件幸事，能为对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有所启迪是为初衷。故乐于为序。

东亭李葆嘉谨识于千秋情缘
时在 2011 年春日融融之中

前言

理论背景和研究价值

最早进行语言系属研究的是西方学者对印欧语系的研究。由于印欧语系的研究趋于成熟，很多西方学者把眼光转向世界各地的语言，其中东南亚一带由于语言资料丰富，语言类型繁复而引起他们的关注。随着西方学者的目光聚焦于汉语系属问题，各种假说应运而生。特别是当代西方学者，他们大胆提出设想并予以论证。现在先了解一下关于汉语同源假说的发展轨迹。

一 理论背景

（一）关于汉语同源论的几种假说

1937年，李方桂基于孔好古（A. Conrady, 1919）、普兹鲁斯克（J. Przyluski, 1931）等人对汉藏语研究的观点，依据当时的理论和调查，确定了包括汉语族、侗台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汉藏语系说。

1963年和1965年，美国学者谢飞（R. Shafer）在《欧亚语》和《欧亚超级语系》中提出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发生学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 Pulleyblank）从语音结构、同源词以及史前文化等方面论证了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发生学关系。

孔好古在《南方大语系（Austrie）和印度支那语言之间的关系》（1916）和《南方大语系—印度支那语对应关系新证》（1923）中，提出了

“南方大语系—印度支那语系”假说。吴克德 (K. Wulff, 1942) 在《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之间的关系》中, 提出了“马来波里尼西亚语—印度支那语系”假说。通过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语的词汇比较, 证明在南方大语系 (南亚语和南岛语) 和汉藏语 (汉泰语和藏缅语) 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吴克德明确指出: 与藏缅语相比, 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更为密切。1942 年白保罗 (P. K. Benedict) 打破了中国学者的“传统疆域决定论”模式, 采用“语言文化决定论”, 把苗瑶语和侗台语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 提出了包含苗瑶语、台语、卡岱语和南岛语的超级语系“澳泰语系”假说。1964 年, 雅洪托夫 (С. Е. Яхонтов) 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中应用语言年代学方法进行研究, 结果与白保罗的分类一样, 认为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藏缅语系。1966 年蒲立本提出汉藏语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观点, 并用他擅长的历史学方法予以验证。1982 年, 斯塔罗斯金 (S. Starostin) 在研究了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布鲁沙斯基语后认定这几种语言同源, 后来在其他学者的继续研究中进一步扩大其语系假说范围, 包括叶尼塞语、巴斯克语、纳—德内语。他试图应用语言年代学方法来证明这些语言同源。

90 年代, 沙加尔 (L. Sagart) 借鉴语言学和考古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分子学等语言学以外的证据论证了汉语—南岛语系的发生学关系, 德里姆 (G. van Driem) 于 1997 年打破了传统的汉藏语系说, 提出汉语属于藏缅语系, 不包括汉语的藏缅语属于“截肢的”藏缅语 (pinioned Tibeto-Burman), 汉语与蕃语族同源的新论点。帅德乐 (S. Starosta, 2005) 基于贝尔伍德 (P. Bellwood, 1991) 和仁弗雷 (C. Renfrew, 1992) 所设想的农业扩散类型理论, 主张由卡—岱语、南岛语、藏缅语、苗瑶语和南亚语组成一个远古“东亚语系”。

这些国外学者对东亚语系的语言发生学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突破了我国学者局限于中国境内语言的研究。但是他们的主要观点散见于某些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 中国学者没有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梳理和研究, 给国内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 中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论著的译介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翻译了一些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著作。第一种是历史语言学史方面的著作, 1956 年, 岑麒祥翻译的梅耶

(A. Meillet) 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4); 1958 年, 钱晋华等翻译的裴特生 (H. Pederson) 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1924); 1960 年, 黄振华翻译了汤姆逊 (W. Thomsen) 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1902); 1984 年, 乐赛月等翻译了白保罗的《汉藏语言概论》(1942), 在该书中, 白保罗提出“澳泰语系假说”, 把侗台—苗瑶语言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 对于长期奉行“汉藏侗台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震动极大。1992 年, 岑麒祥翻译的《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出版。

另外, 一些语言学史的译著中也涉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杨余森译的康德拉绍夫 (H. A. Кондрашов) 的《语言学说史》(1985), 许德宝等译的罗宾斯 (R. H. Robins) 的《简明语言学史》(1997)。

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语言学史著作中, 也涉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如岑麒祥发表的论文《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1957)、著作《语言学史概要》(1958)、冯志伟的《现代语言学流派》(1985)、刘润清的《西方语言学流派》(1999)。但是大多数著作只是对以往历史语言学研究泛泛而论, 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徐通锵先生在访美期间与马提索夫 (J. Matisoff) 进行过汉藏语系关系研究的讨论, 著有《历史语言学》(1991), 但这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 没有提到白保罗的汉藏语系, 也没有涉及其他的超级语系。近来, 吴安其的《历史语言学》(2006) 以介绍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主要目的, 以印欧语和汉藏语为讨论的主要依据, 介绍和解释了历史语言学的经典理论, 以及印欧语和汉藏语的研究状况。但是并没有跳出传统, 只是沿着徐通锵先生的《历史语言学》框架稍稍前移。

(三) 中国学者对沙加尔汉—南岛语系假说的支持

最早进行评论的是邢公畹的《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等系列论文 (《民族语文》1991 年第 3—5 期)。他认为: 沙加尔正在进行的南岛语和汉语的比较工作, 用已得的证据就足以说明这两种语言之间有密切的发生学关系。郑张尚芳的《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1994) 认为, 沙加尔提出南岛语词根与汉语同源说, 指出汉语“字”常对应于原始南岛语的末一音节。虽然一些非常见的例词还可

讨论,但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还应扩展至南亚语系。潘悟云在《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1994)里也持同样的观点。游汝杰在《中国南方语言里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1994)中提出,沙加尔在论证这个问题时,没有涉及汉语方言材料。如果加上汉语方言材料中的同源词,则论证可以更充分。

中国学者对沙加尔文章的翻译,已经发表的有:郑张尚芳等译沙加尔《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1995)、龚群虎译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2004)、李葆嘉主译的《汉语的祖先》(2005),其中有沙加尔的两篇文章。

(四) 中国学者对东亚语系关系的研究

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郑张尚芳等(1994)认为汉语、藏语、台一卡岱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组成“华澳语系”。

还有其他的学者也在积极地进行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金理新的汉藏语对比研究,著作有《上古汉语音系》(2002)、发表的论文有《论形态在确定汉藏同源词中的重要意义》(2000)、《从核心词看汉语和藏语缅甸语的亲疏关系》(2001)、《汉藏语的语音对应与语音相似》(2003);黄树先的汉缅语比较研究,著作《汉缅语比较研究》(2003)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古代汉语和书面缅文进行比较。

(五) 中国学者提出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李葆嘉先生(1989, 1993, 1996, 2003)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涵盖东亚南洋地区的语言文化圈假说。作者论证了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交融的背景上,阐释了汉语在与周边语言互动过程中的推移发展,揭示出一部中国语言史就是一部东亚—南洋民族诸语言接触互动史;一部华夏汉语发展史就是一部华夏汉语同化异化史;一部汉语方言史就是中原民族不断迁徙和周边民族汉语化的融合变迁史,为中国语言及东亚—南洋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2005年,李葆嘉先生主译的《汉语的祖先》(王士元主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在《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汉语的祖先》译序)里,对当前西方的超级语系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了现代语言起源的关键坐标、语言关系类型学的四分法、语言亲属关系

的历史时空性、同源和借用的历时相对性、语言亲缘度标准的综合性、语言深度接触的混合性。作者说,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假说定名为“超级语系”,就是因为明确认识到西方语言的谱系树模式与东亚—南洋语言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龃龉。这些观点对许多人文学科研究领域都具有参考价值,对当前国内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西方学者对汉语系属问题的研究进行得非常深入,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界对西方学者及其理论和观点缺少深入了解,对他们的假说和方法缺少系统的研究以及整体梳理。让中国学者系统地了解并掌握这些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使中国的学者了解他们的假说,了解他们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本选题的目的。

二 研究价值

(一) 东亚语言文化圈的研究是世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前沿课题

从距今 1 万年前到距今 3 千年前,在东西方分别形成了地中海文化圈和东亚—南洋文化圈,即大西洋语言文化圈和太平洋语言文化圈。地中海文化圈也可称之为苏美尔—闪含—印欧语言文化圈,东亚—南洋文化圈也可称之为阿尔泰—华夏—藏缅—南岛—南亚语言文化圈。东亚—南洋文化圈的核心是距今 5000 年到距今 3000 年之间形成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的起源、华夏语言的起源和华夏汉人的起源是三位一体的重大课题。要追溯华夏语言的起源,仅仅依靠传统文献和现代方言远远不够,仅仅联系华夏汉语的毗邻语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应当把华夏汉语的起源和演化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进行跨学科审视(李葆嘉,200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境内语言研究和东亚—南洋语言研究的深入,随着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以及体质人类学、分子遗传学、民族史、移民史等领域研究的新突破,基于追寻“远距离语言”联系的可能性或建构“超级语系”的国际学术背景,“汉语的起源”这一扑朔迷离的问题,成为海内外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研究的聚焦点。

大西洋语言文化圈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并且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西欧,所以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语言发生学关系已经明朗(李葆嘉,2003)。迄今为止,印欧语系是研究最成熟的语系。19 世纪后期,欧洲学者把眼光转向远东语言。经过比对,他们认为汉语与印欧语也存在发生学关系。

欧洲远东语言学研究先驱艾约瑟(J. Edkins)和施莱歇尔(G. Schleicher),几乎同时在《汉语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欧—亚语言同源论试探》(1871)和《汉语—雅利安语》(1872)中提出“汉藏—印欧语同源论”。

20世纪初,就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同源关系,欧洲学者提出了若干种不同的假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汉藏语系”说。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汉语为基准,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几种远距离超级语系假说。如蒲立本(1978)的汉藏—印欧语系假说,沙加尔(1990)的汉—南岛语系假说,斯塔罗斯金(1995)的汉—高加索语系假说,以及德里姆(1997)的汉—蕃语族假说。21世纪初,帅德乐(2001)提出综合性的东亚语系假说。

虽然东亚语言文化圈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由于文献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形声文字,而且藏语与缅甸语是保存古代文献的两大古典语言,它们在汉语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正如希腊文、拉丁文与梵文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一样重要(龚煌城,2003)。但是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在历史比较上存在不平行性,特别是一部分语言是有声调的语言,一部分语言是音节语言,东方语言研究遇到特殊障碍,如果采用西方谱系树的语言研究方法是难以解决的。同时随着汉语强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其语言文化因子必然会向周边扩散,从而促使接触语言纳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同化过程。马伯乐(H. Maspero, 1930)认为,“古代汉族文化与傣族、彝族、苗族文化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点和显著的相似现象,以致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所有这些民族在史前时期就存在共同文化的想法。有过这样的共同文化是确定无疑的,它可以用汉、藏、彝、暹罗等语言中的大量亲缘关系词得到证实,比方说在所有这些语言中都有共同的数词。虽然不能根据这些相似形式就遽然断言,这些语言一定是亲属语言,但是这些词语可以表明: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彼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李葆嘉,2003)。

近年来,西方汉学家对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进行了很多探索,特别是沙加尔的汉藏—南岛超级语系假说,以前的历史语言比较研究仅仅利用词汇、音韵比较。沙加尔在词汇、音韵比较的基础上增加了形态比较,他利用南岛语的末一音节与汉语的“字”对比,同时还增加了考古学、分子遗传学方面的证据,推进了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为中国历史语言比

较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界对他们的成果介绍很少,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之不甚了了。

(二) 东亚语言关系研究仍然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中国以后虽然对汉语历史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以及东亚语言关系的研究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存在如下重要问题:

1. 19 世纪经典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重要论著没有译成汉语,如拉斯克(R. Rask)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的起源研究》、葆朴(F. Bopp)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1816)、格里姆(J. Grimm)的《德语语法》,施莱歇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勃鲁格曼(K. Brugmann)和德尔布吕克(B. Delbrück)合著的《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和保罗(H. Paul)的《历史语言学原理》。当代一些重要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只有沙加尔的少量论著(4 种)译成中文,斯塔罗斯金的有 1 篇译成中文,其他学者,如德里姆、帅德乐等的论著都没有译成中文。

2. 适合于印欧语言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东方。需要根据东方语言的历史事实,建立新的模型和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假说。

(三) 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亟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与之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进行新的探索。邢公畹(1991)、郑张尚芳和潘悟云(1994)等提出,由汉语、藏缅语、台一卡岱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组成华澳语系。郑张尚芳(1994)初步制定了用于华澳语系比較的《华澳语言比较三百核心词表》。李葆嘉(1996)提出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包括澳泰语(南岛语、台一卡岱语)、南亚语(孟—高棉语、越南语、苗瑶语)、汉语(南方汉语、北方汉语)、藏缅语(彝语、藏语、缅语、景颇语、羌语)、阿尔泰语(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以及具有南岛语与阿尔泰语混合性质的日语和朝鲜语。这一“语言文化圈”假说,基于世界语言关系类型学,摆脱了西方传统的语言谱系树模式。但是有必要对东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梳理和比较,以

提出更适合于东亚语言亲缘关系（亲缘度）研究的新模式（李葆嘉，2005）。

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多地了解西方学者对东亚语言关系研究的假说和成果；促使中国学者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界的研究；促使中国学者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语言调查和资料搜集跳出中国大陆语言的范围；借鉴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基于汉语及周边相关语言的实际情况，建立东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批评并指正。

李 艳

2011年9月9日